

返京的焦急心情。如前所述，他晚年已有隐疾在身，此时，可能病已发作（四天后成祖即“驾崩”），预感不祥，因而急欲赶回京去处理皇位继承的大事。且看《太宗实录》里一段“欲盖弥彰”的记载，说的是成祖讯问归程日期后，“既而谕（杨）荣、（金）幼孜曰：‘东宫历涉年久，政务已熟，还京后，军事悉付之，朕惟优游暮年，享安和之福’。”<sup>⑧</sup>这里，不但一笔抹煞前述成祖与太子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且也无法解释成祖为什么急欲返京的问题。成祖若果真如此信任太子，那么太子已膺监国重任，即使成祖“中道崩殂”，太子理应即位，他亦不应有什么身后之忧而急于赶回京城了。即使有事需要交代，也可在“遗诏”里讲清。而问题的关键恰在于成祖生前始终未立过传位遗诏，所以修《太宗实录》时需要加进杨荣等提供的那段莫须有的话作伏笔，以为后面编造遗诏找合法根据。可以想见，当时成祖深知在他身边的这些人都是皇太孙的亲信，也即间接的“太子党”（详见后文），即使他立下皇位变换的“遗诏”，只要他中途合眼，遗诏也有可能被篡改。因此，他才迫切希望及早返京，但病情的意外变化使他未能如愿。

成祖急切讯问归程日期后的第三天，他的病情急转直下，“己丑……上不豫……庚寅，车驾至榆木川，上大渐，遗命传位皇太子……辛卯，上崩。太监马云等以六师在远外，秘不发表，密与大学士杨荣、金幼孜议丧事……壬辰，文渊大学士杨荣、御马监少监海涛奉遗命驱讬皇太子”<sup>⑨</sup>。尽管这里记得似乎天衣无缝，但在《仁宗实录》里，事情的真象却在无意中全部泄露出来了。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，已即帝位的明仁宗下了一道感激有功之臣的敕书。《实录》中记述的是：“太宗疾作，顿剧，已而崩于榆木川。中官马云等皆苍黄莫知所措，乃密召荣、幼孜入御幕中，首谋丧事……或有叹于他事，

写敕用宝，遣人驰报。荣等曰：‘谁敢尔，先帝在即称敕，宾天而称敕诈’……乃命中官备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遗命传位之意启皇太子。云等从之”。<sup>⑩</sup>从这段记述中，细加推敲，事情真像已很清楚。首先，成祖临崩时身边只有宦官，且“苍黄莫知所措”，始密召杨荣、金幼孜两人前去商量。所以张惶失措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成祖临终前未及留下任何遗言；二是留下的遗言可能对皇太子不利。从各种情况来看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其次，所谓“或有叹于他事”，显然是指有某种慨叹，而且有所顾忌而不得让汉、赵二王得知实情。以宦官的原意，是不惜冒“乱命”的风险，伪托成祖手笔写敕用宝安排太子即位。由此可见，成祖并没有亲留“遗命”文字，而且也没有经他认可用宝的代笔救命文字。显然，所谓遗命是成祖已歿后，杨荣等不取宦官写敕之议而自作主张撰写的。“乃命中官备以大行皇帝……遗命传位之意”，可见前述《太宗实录》所载“上大渐，遗命传位皇太子”之事纯系编造，而所谓的“遗诏”内容，显系马云、海涛等宦官按照两位大学士的授意、指点提供的。

正由于这些原因，仁宗才赐敕酬谢杨荣等。“荣初抵京，上哀恻未及访问。至是，有以为言者，上嘉叹良久，乃降恻奖谕”<sup>⑪</sup>。仁宗的憨愚正在这些地方。他以为父亲在临死之际原谅了他，留下遗诏让他顺利即位。而事后有人——当然是宦官——把内情告诉了他，于是仁宗不免百感交集。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，仁宗感激地加赐杨荣为工部尚书，并兼前官，享食三俸，敕云：“皇考上宾，六军在外……惟卿尽忠为国，报先帝恩德，独为果断，至有今日……曩者哀悼仓惶之际，报卿甚微，今追前衍……特升卿为工部尚书，前官如故，三俸俱支，全支尚书本色……”<sup>⑫</sup>。第二年，杨荣、金幼孜固辞三俸，大约是有愧于这种恩赐。而仁宗则再次重述前言，并声称“今奖三俸，岂为过多，